

[劳动关系研究]

数字游牧主义的本质求索：以中国数字游牧民为例^{*}

郑 祁¹，徐欣颖²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保险学院, 北京 100105)

[摘要]随着全球化、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游牧作为一种工作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新的职业风潮。本研究在明晰数字游牧主义概念的基础上,借由德勒兹和我国蒙古游牧民族形象,通过对我国数字游牧民的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和线上内容分析,发现倡导“解放”“自由”“自主”的数字游牧主义表面上呈现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反对,而其发展过程中自身的商品化、职业化、制度化和背后的元工作却在不断模仿和呼应商业活动和制度体系中的权力动态。某种意义上,数字游牧主义应为对市场需求的回应和资本主义的延伸,其表面标榜“协同合作”“去中心化”“罗曼主义”“自立自主”,但本质上的运行逻辑却是“利益驱动”。

[关键词]数字游牧主义;商品化;职业化;制度化;元工作

[中图分类号] F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375 (2024) 05-0087-16

一、引言

全球化、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正在重塑工作世界的轮廓,各类工作模式应运而生,工作的时空组织形式也正经历转型。在此背景下,包括数字游牧在内的一阵新“职业化”风潮刮起。

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变革,工作趋向灵活、脆弱、自主与协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加入数字游牧民行列。2019年,美国有约410万独立承揽人和320万传统雇员自称为数字游牧民^[1]。疫情后这一数字翻倍,趋势亦扩展至欧亚地区。《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显示,76.4%的中国“00后”愿成为数字游牧民,他们活跃在社交媒体、在线辅导、市场营销等多个领域。

学者们对数字游牧主义及其群体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2]。尽管如此,关于如何界定数字游牧主义和数字游牧民的问题,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且这些数字游牧民对于自身“身份”的认知也存在分歧^{[3][15]}。媒体对数字游牧主义的报道同样充满热情,将其描绘为一种具有解放性、自由度和充实感的生活方式,认为它能够替代传统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和单调的办公室工作模式,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选择。

这种观点一时激起部分学者的质疑,他们指出数字游牧或许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好和理想,自由、

* [收稿日期] 2024-03-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3LLYJA0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郑祁(1985—),女,云南昆明人,经济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零工经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徐欣颖(2001—),女,浙江台州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零工经济、人工智能对企业的影响。

解放的背后或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内核。针对这一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涉足数字游牧主义商品化和职业化的研究^[4],但均较零散,没有系统性的综合分析。国内的相关探索更是处于现象描述和文献综述的初级阶段,鲜有研究在现象层面概念化数字游牧主义的基础上,从多维度出发深入探索其内核与本质。此外,绝大多数领域内的研究都是采用单一的文献综述、在线内容分析、论坛内容分析或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因此,吸纳既有研究经验,本研究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基础上,佐以线上内容分析和观察等资料收集手段,三角互证式深挖数字游牧主义的本质。研究发现,数字游牧主义并非表面上的那么美好与光鲜,实则是资本主义的延伸而非替代:它是利益驱动下的“协同合作”和“去中心化”,是张贴着“罗曼主义”标签的“实用主义”,是为了脱离“依附”而选择“依附”,也是“看不见”却“不能少”的付出。

此外,为了更好地进行数字游牧主义的本质挖掘,本研究回溯了东西方传统游牧主义文化,借鉴了德勒兹(Deleuze)与加塔利(Guattari)所描绘的游牧民^[5],以及我国蒙古游牧民族的形象。在学者们看来,游牧民是指那些能够掀起变革的人物,是“自由”的化身,更是对秩序的“挑战”^[6]。伴随这些标签,即使进入数字时代,游牧主义也通常被描绘为传统主流范式(资本主义)的“替代”。然而,研究认为,资本主义力量仍在不断侵蚀并试图重新征服游牧主义所开拓的疆土,后者在逐渐呈现出商品化、职业化、制度化的同时,还充斥着应接不暇的“元工作”。因此,数字游牧主义似乎与游牧民的自治、自由的特征相去甚远,而更像资本主义工作世界的直接延伸。

二、文献综述

(一) 数字游牧主义的概念综述和演进

自20世纪80年代罗伯茨骑自行车旅行并以写作维生,数字游牧主义的探索便已启程。技术革新不断拓宽数字游牧民的机遇,远程支付和即时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共享经济的兴起,为自由职业者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机会。例如,Fiverr等平台通过发布“首席数字游牧民”职位^[7],为全球自由职业者开辟了新路径。国内亦涌现了圆领、电鸭、FreeLab等平台,它们通过发布远程工作信息,助力数字游牧民根据个人技能寻找合适的工作,推动了这一群体规模的快速增长。

从2008年“数字游牧民”概念在西方第一次登上《经济学人》杂志,到载入《卫报》^[8],再到遍布今天国内的大小媒体,正如穆勒所言,“数字游牧民已经从一个虚无缥缈的虚构角色演变为当前工作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社会角色”。围绕数字游牧主义这一主题涌现越来越多的书籍、指南、博客、论坛、视频、报纸文章,足以证明无论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作为一种职业奋斗目标,其关注度日益增长。

众多学者对数字游牧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预测。20世纪80年代,信息化理想主义者如托夫勒预见了一种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提出“电子化住宅”概念,预示着数字游牧民的兴起。它融合了网络技术与远程工作的元素^[9]。阿塔利进一步肯定了数字游牧民在未来社会的重要性,并预测了可能出现的二元社会结构。在这一结构中,“精英们”依靠移动设备实现全球漫游,却也受限于持续工作的束缚^[10]。而那些缺乏特权的人群,则可能因贫困被迫过上游牧生活。Attali在其著作中进一步探讨了游牧主义,将企业和公司比作吸引超级游牧民的“剧院”或“马戏团”,这些超级游牧民包括金融战略家、高管、设计师等专业人士^[11],他们为短期或长期项目工作,体现了数字游牧主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学界对数字游牧主义及其群体的概念界定尚未形成统一意见。Makimoto和Manners^[12]在*Digital Nomad*一书中首次提出数字游牧主义,描述了一种在旅行中工作的群体现象,但未能充分强调其旅居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导致其与远程工作概念相混淆^[13]。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化,Aroles等^{[13][20]}采纳Sobel和Rossi^[14]的观点,认为数字游牧主义不仅是一种工作形式,更是一种将

工作融入旅行的生活范式, 强调了其持续和全球性的流动性。Wang 等^[15]提出, 数字游牧主义融合了经济活动、文化现象和技术驱动的工作与组织形态。然而, 也有学者将其简单定义为网络信息通信社会的产物^[16], 忽略了数字游牧主义与工作、生活的具体联系。数字游牧主义是一个包含多种要素的复合概念, 现有定义多从单一视角出发, 缺乏综合性, 未能充分整合工作、生活方式和技术等因素。

在定义数字游牧民时, 学者们多从工作、生活和技术等单一视角出发, 缺乏综合性。从工作视角看, 数字游牧民被视作能够在任何地方工作的劳动者, 与仅提供时间灵活性的在家工作 (Working from Home) 不同, “Working from Anywhere” 提供了时间和地点的双重灵活性, 帮助数字游牧民实现职业与个性的自由。从生活方式角度, 学者们依据是否有大本营和旅居流向, 将数字游牧民分为有固定居住地的旅居者和无固定居住地的常年流动者, 他们根据个人热情和生活需求选择居住地, 而非仅基于工作便利^[17]。技术视角的学者则强调, 数字游牧民是利用数字技术的高技能劳动者, 通过便携设备和网络自由决定工作地点和时间^[18]。但这种定义较为狭隘, 侧重于工作的远程性和地点的独立性, 主要限于知识型劳动者, 未能全面考虑生活方式和其他数字游牧群体的多样性。

从罗伯茨一个人的数字游牧主义到现在遍布全球的数字游牧民, 始于实践, 途经媒介, 再蔓延至学术领域, 其概念到底应如何界定, 定论始终未成。数字游牧主义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不应从单一视角出发将其简单解读为时间地点灵活的“远程工作”、有无大本营的“旅居生活”或技术进步引发的“新现象”, 而应该赋予它综合三类视角的内涵。结合前述文献, 本研究不以有无大本营、旅居流向等细节要素作为判断数字游牧主义和数字游牧民存在与否的标准, 而是综合性考量数字技术带来的远程工作的可能性、工作与生活方式的融合, 提出: 现象层面, 数字游牧主义是被休闲目的所驱动, 借助数字技术, 实现边旅行边工作, 不被工作时间、地点束缚的一种工作—生活范式与理念, 而数字游牧民便是凭借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性, 践行边旅行边工作的工作—生活范式与理念的群体。

数字游牧主义的概念经历了从实践的萌芽, 到媒介的关注, 再到学界的探索的过程。然而, 随着数字游牧实践在全球范围的展开, 其背后隐藏的本质也逐渐展露。带着对本质问题的求索之心, 研究引入德勒兹与加塔利以及我国蒙古游牧民族的形象, 以便加深对游牧主义本质问题的探讨。

(二) 来自德勒兹和我国的蒙古游牧民族形象

德勒兹是与福柯、德里达齐名的当代著名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他的著作《差异与重复》《褶子: 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以及与加塔利合著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千高原》均为后结构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千高原》中, 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条痕空间和光滑空间的概念。条痕空间是一种高度规范化、规则众多的空间形式, 而光滑空间则以其开放性和变革性著称, 常常展现出对规范化的抵抗^[19]。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概念框架中, 游牧民族象征着光滑空间, 而国家则代表着条痕空间。国家通过条痕化原本光滑的空间来行使控制, 如 Noyes 所述: “不迁徙的国家始终在努力控制劳动力的流动。”^[20]相比之下, 光滑空间的变革性在于其不断消除过度规制, 探索新的可能性^[21]。德勒兹和加塔利进一步指出, 光滑空间与条痕空间并非完全对立, 它们之间存在动态的转化关系: 光滑空间可逐渐演变为条痕空间, 而条痕空间也能逆转为光滑空间。

游牧民族通过占领未被条痕化的空间和光滑化条痕空间, 挑战规范, 拥抱差异与不确定性。他们被视为对传统的颠覆^[22], 具有变革潜力, 是自由的化身和对既有秩序的突破, 以运动、差异、变化的形式存在。

在德勒兹的哲学价值体系下, 游牧代表了一种旨在摆脱严苛规制, 由差异和重复运动所构筑的、

非科层化的自由配置状态，游牧思想以反思、反理性、反束缚和倡导多元为特征^[23]，游牧民族则是既定秩序、等级、权力的反叛者^[24]。

游牧文化并非西方所独有，在我国，游牧文化是高原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游牧精神的存在让我国蒙古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展现出极大的变异性和开放性。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在比较不同类型人类文化时，提出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草原，生存条件恶劣导致的“内不足”驱动了“向外找”的发展需求，因此，游牧文化代表“流动”和“进取”，而游牧民族“其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阻碍，于是遂有强烈战胜与克服欲”^[25]。“游牧生活将衣食住行都依赖于所放牧的家畜上……游牧民族的财富以家畜数量为衡量指标，为了维持和增加财富水平，他们需要（不断流动）以寻求更肥沃的牧场。”^[26]气候恶劣的高寒内陆高原、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家畜增长对广阔牧场的无限需求，促进了极具开放性、流动性和进取性的我国蒙古民族游牧文化的形成。

当审视该如何构建数字游牧主义轮廓时，研究发现无论是德勒兹的游牧民族形象还是我国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形象，都以“自由”“流动”“开放”和“拥抱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数字游牧主义在社交平台和公众媒体上影响力日益扩大，然而其实际表现却让人们产生质疑：其在多大程度上仍体现为原始的与传统规范迥然不同的状态。研究认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所理解的游牧民族形象以及我国蒙古游牧民族形象都可以帮助我们突破现象，更深层次地挖掘数字游牧主义的本质问题。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收集

国内外现有对数字游牧民群体的研究中以文献整理、线上资料分析为主，缺少借助访谈、观察等质性研究范式。但是，要想对数字游牧主义本质有深入、丰富的探索，离不开一手资料的获取。因此，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并佐以观察以及挖掘多种类型的线上资料等3种途径来获取质性研究材料。具体资料收集方式如下：

1. 深度访谈

访谈是定性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料收集方式，是建构第一手资料的重要途径。2023年3月—6月，研究通过线上、线下联络的方式，随机选取了8位数字游牧民作为访谈对象，其中线下面对面访谈3人、线上通过腾讯视频会议和微信视频聊天访谈5人，时长均超过40分钟，平均60分钟，最长120分钟。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根据研究主题和目的，结合相关文献设计了详细的访谈提纲。访谈开始前，向被访对象阐明访谈的主题和目的，确保受访者充分理解访谈意图，以保证访谈质量；过程中，尽力保持中立态度，扮演好镜头角色，留意捕捉新的线索，对有研究价值的回答进行追问，并全程进行语音录制；访谈结束后，根据访谈记录和录音逐字逐句地将音频转录成文本资料。同时，我们对受访者姓名作匿名处理，用英文字母A-L编号代替，对线下和线上的受访者采用了不同的字母标注（DL为线下受访者，XS为线上受访者），数字表示访谈日期和当日访谈排位（例如，20230323XS-1表示2023年3月23日线上的第一位被访者）。受访者的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受访数字游牧民的基本信息

被访者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户籍所在地	就业状态	婚姻状况
20230323DL-1	L女士	女	90后	本科	福建	自由职业	未婚
20230323DL-2	阿Z	女	90后	本科	浙江	被雇、自由职业	未婚
20230329DL-1	Z先生	男	90后	硕士	山东	自由职业者	未婚

续表 1 受访数字游牧民的基本信息

被访者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户籍所在地	就业状态	婚姻状况
20230417XS-1	B 女士	女	90 后	本科	河北	被雇、自由职业	未婚
20230424XS-1	D 先生	男	90 后	本科	福建	创业	未婚
20230503XS-1	大 X	男	90 后	本科	四川	创业	未婚
20230524XS-1	小 W	男	90 后	硕士	山东	被雇、自由职业	未婚
20230620XS-1	N 女士	女	90 后	本科	湖北	创业	未婚

2. 观察

观察是人类认识周围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除了访谈之外,定性研究中另外一个主要的收集资料的方法。2023年3月到4月期间,笔者前往数字游牧民的国内聚集地之一——大理,结合参与式观察与非参与式观察的形式,直接进入大理部分数字游牧民聚集社区(例如:DaLi Hub、RW 实验室、大理 706、上上居等)生活与工作,亲身参与数字游牧民经验分享会、周度 free talk(自由谈话)活动、青年派对、焦点小组讨论、植物 T 台秀等活动,观察和感受数字游牧民日常和工作中的言行状态,了解数字游牧民对自身行为意义的解释,获取更多新的真实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进一步对数字游牧民的本质进行探索,以及为构建相关理论提供具体的论证基础。

3. 线上资料

在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广泛利用了各种在线资料,包括企业广告、公司年报、网络新闻媒体和在线平台网站。本研究也将线上资料作为内容分析的主要来源,特别关注小红书、豆瓣和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与数字游牧民个体和社区直接相关的帖子,以及小宇宙 APP 中的数字游牧民社区播客。这些资料在研究的各个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揭示数字游牧民的本质方面。需要指出的是,研究的线上资料收集完全基于对公众开放的平台。

具体来说,线上资料的收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笔者广泛阅读了小红书、豆瓣等平台上的相关帖子,如“数字游牧民部落”“数字游牧民养成记”“数字游牧民中国”,以了解数字游牧民的工作生活状态和获取相关在线资源,并收集了 17 篇代表性文章。第二阶段,聚焦数字游牧民社区的线上平台,如“DNA 数字游牧民”“RW 实验室”“DH 共享办公空间”“大理 NCC”,深入理解社区的共创共建和日常活动,收集了 11 篇文章。第三阶段,整理了 5 期 UniX 数字游牧民社区的播客,进一步丰富了研究的资料和观点。此外,研究还根据线上资料不断优化访谈提纲,以提升深度访谈的信效度。

(二) 编码分析

为了阐明研究中涉及的概念和主题,研究采用归纳的方式,通过使用 NVivo 软件对上述质性研究材料进行分析和编码。需要强调的是,在编码完上述质性资料后,研究随机选取了 6 篇数字游牧民相关文章,发现没有出现新的编码内容,说明编码内容已达到饱和,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有效性。编码过程中,研究遵循一级、二级和三级逐级编码的方式,最终析出一级编码、二级主题和研究的总主题。

一级编码是将原始资料分解后进行逐级概念化的过程,即识别各个概念的属性及其维度。首先,研究对整理好的原始资料进行逐字逐句对比分析并寻找关键词拟定最初标签;其次,重新整合访谈资料并抽象概括出具有核心内容的概念;最后,将概念分类合并进而提炼出高层次的范畴。上述步骤最终析出以下关键词:疫情、逃离、孤独、自由、身份认知、旅行、互联网、远程办公、生活方式、服务、产品、可持续、技能、培训、创业、游牧社区、合作、去中心化、政策、规则、

过渡、资源动员。

二级主题是在一级编码的基础上,融合了现有对数字游牧主义研究的观点和争论,更好地明确本研究与现有文献之间的异同以建立关联。在这个阶段,研究通过反复阅读原始资料,仔细梳理一级编码,逐步提高概念抽象层次,进一步挖掘出核心范畴,由此归纳出六个核心研究主题:概念认知的模糊性、游牧动机、商品化、职业化、制度化、元工作。基于二级主题,研究最终将总主题聚焦于对数字游牧主义本质的探索。

四、数字游牧民的画像、动机与身份认知的模糊性

通过编码,研究分别从性别、学历、年龄、婚恋状态、子女等10个方面析出了我国现阶段数字游牧民的基础画像标签:女性居多、90后、沿海地区、本科毕业、无房产、未婚有伴侣、无子女、前大厂程序员、现职业多样化、游牧始于疫情、国内游牧。

女性居多的90后沿海地区本科生是数字游牧民的生力军。虽然受访的8人中,4人是女性4人为男性,看似性别比较平均,但结合线上内容分析(数字游牧民自媒体大咖多为女性,例如裸辞小张、数字游牧民野行yeye、阿猫等),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女性数字游牧民数量多于男性,隐约间闪现出传统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割的影子^①。

游牧民们基本是90后新生代,多来自福建、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也有少量来自四川、湖南),大多受过本科教育。这表明,有条件接触最新资讯、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并具备较高受教育水平的年轻新生代更容易接受并践行数字游牧主义。

数字游牧民游牧前多为大厂程序员,游牧后工作内容和职业状态多样化。被调者游牧之前大多是大厂员工,主体为程序员,也有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等行政类工作的人,少部分为培训机构教师、设计师和创业者。这表明数字游牧民入行前收入较高或都有一定的资本积累,为游牧奠定了物质基础。游牧之后工作类型和就业状态开始变得多样化,能在数字游牧民中找到公社主理人、生活教练、导游、插画师、线上教师,甚至是命理师的踪影,或可推测个体在数字游牧之后更倾向依据自身爱好或特长选择所从事的工作。但同时也发现,从事两份及以上的工作成为大部分数字游牧民的常态,并且与爱好相关的工作往往不能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即便是在游牧,数字游牧民们也需要不断付出努力为自己的爱好买单。

数字游牧民们基本没有房产,都处于未婚无子女状态,但大多都有伴侣(男女朋友)。无论是之前在大厂待过的高薪程序员,还是曾经自立门户的创业者,“未婚”“无子”“无房”成为数字游牧民的统一标签:“有了房子哪还能游得起来”“房子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吧”“暂时没结婚的打算”。在我国,传统意义上,婚姻、孩子和房产都是让人“稳定”与“扎根”的“必需”,也是对“变化”“自由”与“不羁”的“捆绑”,而后者乃是数字游牧的要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游牧民都身处婚、孩、房的“围城”之外。但这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当前国内数字游牧民的年轻态有关,不知情况是否会随着岁月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有趣的是,大家虽然未婚,却基本都有同行伴侣(男女朋友),以排遣游牧过程中的负面情绪,“有些时候面试一天,很累啊,但他(男友)的一个拥抱就可以恢复元气”。游牧生活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美好,也需要面对与释放似曾相识(在传统非正规就业中)的孤独、压力与苦闷。

大部分受访者的游牧时间始于疫情之后且现阶段基本限于在国内游牧。目前的数字游牧民群体都还只是游牧“萌新”,“国内溜达”为先,疫情成为他们游牧的重要契机,疫情时开始普及

^①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被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格尔和皮奥里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由于社会和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形成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差异,不同人群获得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渠道的差别,导致不同人群在业部门、职位以及收入模式上的明显差异,比较突出的如在种族、性别与移民之间的分层等。

的远程办公模式与对自由生活的渴望, 成为年轻人步入数字游牧的助力器。

此外, 大家的游牧动机也非常不同, 从试图探索内在自我到“绝望”逃离企业世界, 游牧动机大致可分为“追求”与“逃离”, 即主动与被动两大类。主动“追求”包括追求精神满足, 追求自由, 追求社交(寻找“同频的人”), 追求更好的生活与工作。被动“逃离”则是要探索与企业世界不同的事物, 逃离工作(创业)压力, 逃离就业瓶颈, 逃离传统企业世界里的困扰与负担。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似乎类似于我国蒙古族与德勒兹描绘的游牧民族, 试图通过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自由自在地“流动”和“旅居”, 或将自己从传统“禁锢”中解放出来, 这种方式将工作以及个体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概念化、具体化。其中, 许多人会将他们离开正规就业的行为表述为“信仰的飞跃”“价值的追求”, 探索未知的领域, 尝试不同的生活—工作方式。

通过访谈资料和线上内容分析, 研究发现数字游牧民群体呈现显著差异。特别是被访的8名游牧民基本从事不同职业(游牧公社主理人、互联网公司创业者、生活教练、导游、插画师、线上教师、命理师), 抑或是身兼数职。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 从事某些职业活动常被视作数字游牧民身份合法化的象征, 然而, 对于何种职业活动应被划归为数字游牧民的专属职业范围仍存分歧^{[3]120}。此外, 他们的就业状态也不一, 有被雇者、自由职业者、创业者, 也有兼职者(见表2)。其中, 创业者多全职创业, 而被雇者多有其他兼职(兼职多源于爱好)。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大多数的创业与兼职一样都出于主观的爱好与价值实现倾向, 是积极主动所选, 而选择被雇则更多是为理想与价值实现打下物质基础。这些所有的职业或就业状态都支持基于数字手段的远程办公, 当然, 这也是“游牧”的前提。

表2 数字游牧民的职业与就业状况

被访者编号	姓名	就业状态	职业类别			
			主业	职业二	职业三	职业四
20230323DL-1	L女士	自由职业	职业咨询师	求职顾问	公益项目导师	
20230323DL-2	阿Z	被雇、自由职业	互联网公司业务员	生活教练	创业合伙人	品牌营销顾问
20230329DL-1	Z先生	自由职业	插画师	命理师	摄影师	
20230417XS-1	B女士	被雇、自由职业	旅游公司领队	旅游公司招聘专员	内容博主	
20230424XS-1	D先生	创业	游牧社区主理人			
20230503XS-1	X先生	创业	游牧社区主理人			
20230524XS-1	小W	被雇、自由职业	创业公司产品经理	播客主播		
20230620XS-1	N女士	创业	创业合伙人			

就数字游牧主义和数字游牧民概念本身而言, 大家的认知也不太一致, 部分人甚至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典型的”数字游牧民。特别是其中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数字游牧相关概念涉及的流动性与模糊性, 即承认个体认知与外界或者普遍认知有差异, 并对自己数字游牧民身份认同抱有不稳定性。就数字游牧民的概念认知来说, 有认为是自由职业者的, 有认为是远程工作的自由职业者的, 也有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虽然大家的描述不一, 但实际上都肯定了数字游牧民的“办

公远程化”和“生活居无定所”的特征。然而，其中不乏对自己游牧民身份认同满怀不确定，甚至认为自己不算“严格意义上数字游牧民”的。

五、数字游牧主义的商品化、职业化、制度化和元工作

（一）商品化——利益驱动下的“协同合作”与“去中心化”

数字游牧主义不仅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各类专门致力于孕育数字游牧商品化的载体也如雨后天春笋般出现，例如：Dali Hub、安吉DNA、RW实验室等线下共居地点和协同办公空间（为数字游牧民提供灵活、共享或私人办公桌和办公空间的基础设施），圆领、电鸭等远程工作信息平台（为数字游牧民提供远程工作需求信息），知识星球和豆瓣数字游牧民社区等线上数字游牧社区，“游牧计划”等数字游牧论坛，数字游牧营（旨在集中志同道合的数字游牧民，促进他们彼此间的合作与交往，指导他们如何成功创业等），数字游牧社群（例如，出现一些专门为数字游牧民组织旅行的公司）。

上述现象最终形塑了围绕服务和产品两方面内容的数字游牧主义的商品化，前者包括有偿的心理咨询、设计、导游、内容输出和培训，后者主要有商业品牌营销和自我品牌创立。商品化的理念支持来自对“协同合作”和“去中心化”的认同。

“如果从微观的组织管理视角，我认为它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去中心化就意味着大家基本上都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领导，是自发的，每个人要去管理，每个人去贡献出自己最大的热情出来做。”（来源：R分享会，X先生）

“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你的名字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开始协作了，我们没有年龄的限制，没有性别的限制，没有国籍的限制，没有地理位置的限制，任何人只要你能够上网，只要你能够远程协作，我们就可以汇聚在一起协同办公。”（被访者编号：20230620XS-1）

虽然看似强调游牧主义蕴含平等、共享互助的“去中心化”和“协同合作”的社群精神，数字游牧民们都在“为爱发电”，但上述活动的顺利举办和社区的创立却需要产生实际花销。因此，各类论坛、活动通常会根据等级被打包定价，数字游牧民的出价与其资源获取量可能成正比。一部分数字游牧民组织设置准入门槛，需要支付年费才能加入，或入群前需要发放“随心红包”。共享办公与共居空间也需要支付一定租金。愿意负担费用的人就能获取更多资源，从而在圈内有更高的知名度与曝光率，促进自身可识别身份的塑造^[27]。然而，这一切将最终导致数字游牧民内部的分化与隔离。

“其实游牧社区现在已经有点变味了，因为人多之后就会有一些老的人，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圈子，你新的人没办法去融入进去。”（被访者编号：20230323DL-2）

因此，将数字游牧主义描述成一种工作—生活方式成为悖论，游牧主义本身已经被商品化。部分人能够通过某些活动成为所谓“成功的”数字游牧民，致力于实现数字游牧主义的“常态化”。一些论坛和机构逐渐成为构建数字游牧主义的所谓“权威”和“榜样”，时刻思考如何将数字游牧主义快速“产业化”。

“其实说直白点，就是要让这个数字游牧民群体更值钱，就只有这样这个群体才能够去获得一些更好的资源和机会，然后生活和个人成长才会有更好的保障，谈钱不羞耻。”（来源：小宇

宙播客)

“我和同样身为数字游牧民的 Felix 一起发起并成立了 FreeBe DAO, 期待能够将数字游牧民们在线上聚集在一起, 通过项目共创的方式, 为世界创造更多真实价值, 最终能够实现个体的经济自由。”(来源: DNA 数字游民公社公众号)

此外, 很多人也开始主动迎合数字游牧民社区的需求, 如公开演讲、提供在线咨询服务、进行数字营销、从事网络开发、创建企业, 让自己变成更“实用”的数字游牧民。其中一些人将自己塑造为数字游牧大师, 与传统企业世界的管理大师异曲同工。这些游牧大师通过平台、自媒体进行叙事, 将自己的成功游牧经验传播给其他数字游牧民, 教他们如何在“游牧”的同时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其中, 部分人通过在自己的视频、博客中植入广告, 或者直接收取会费来获取经济收入。例如数字游牧民 J 先生就规律性地在其知识星球客户端的线上数字游牧社区中, 不定期发布诸如“如何成为数字游牧民”“如何在游牧中获取收入”等经验贴(如“数字游牧民必读书单”“数字游牧民创业指南”“有目地点推荐”), 而看到这些“干货”, 则需要支付知识星球标价 199 元人民币的年费。

总结来说, 数字游牧主义的商品化是指以一系列行为、活动、组织、基建为载体, 以“协同合作”和“去中心化”为理念支持, 以产品销售与服务销售为内容, 在数字游牧进程中实现经济利益和商业目的的趋势。在数字游牧群体上, 出现了一系列以盈利为目的的数字游牧主义相关活动与组织。从个体层面看: 一是付费与其能从活动、组织中所获取的资源成正比, 数字游牧民内部呈现隔离; 二是部分游牧民通过经验技能的分享或在分享中植入广告获取收入。这些盈利动机和行为的萌生发展, 一定程度上从技能、培训等方面催化了数字游牧主义的职业化。由此, “利益驱动”披上了数字游牧主义这件“休闲驱动”的、看似“平等”“共享”和“互助”的外衣。然而, 数字游牧民们对“商业化”的态度却比较乐观, 视之为“双刃剑”, 虽然“被白嫖”“向下压榨”“竞争激烈”“勉强维持运转”“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等问题时有发生, 但仍然“美好”与“不可或缺”。

(二) 职业化——张贴着“罗曼主义”标签的“实用主义”

媒体倾向美化数字游牧主义的概念, 相关的书籍和报道都广泛宣传其魅力所在, 强调其“低门槛”“易参与”的特征, 任何人只要具备一定技能, 都能成为数字游牧民的一员。于是, 数字游牧主义成为了异国情调、自由旅行、休闲生活的代名词, 被烙上“解放”“令人羡慕”的标签, 人们趋之若鹜。然而, 这些浪漫化描述却掩盖了数字游牧主义职业化的“实用主义”本质^{[3]123}。

所谓“职业化”, 主要体现为行动前的“资格”准备、行动中的努力工作, 通常借力于合作共赢与社区帮助。一些人在正式开始“游牧”之前会做足功课, 寻求相关建议, 弄清成为一名“合格”的数字游牧民需要提前做哪些技能、资格、经验等方面的准备。

“比如说像我这种初阶的(游牧民), 那我肯定就是在网上搜啊, 要优先知道哪些是适合游牧的地方, 那我慢慢就会往这些点去聚集。”(被访者编号: 20230323DL-1)

“某种程度上说, 成为数字游牧民, 确实需要一些技能在身。”(来源: 谷雨实验室公众号)

一些想要借此启动线上创业的人则会不断寻找志同道合者, 或借社区帮助以达成协作共赢目的。游牧过程中, 不乏有人通过论坛、博客等内容创造的方式进行商品、服务宣传实现商业价值。

“我刷小红书, 就刷到了一个男的也是(画)这种植物画。我就跟他聊合作, 说我们这边缺

产品，但我们有自己的营销和一些线下的资源，能不能整合一下？嗯，他就说好。”（被访者编号：20230323DL-2）

“我们这个社区会去做的事情就是带领大家一起首先解决你当下的职业或者是技能变现的问题。”（来源：小宇宙播客）

鉴于以上情况，受众往往能在“表象”中嗅出“实质”的商业气息。例如，刷到某些游牧民博主介绍某“游牧民友好”城市的视频时，大家可能会看到该内容相关的植入广告^[28]。部分数字游牧民起初只是为了更悠闲地生活而开展线上业务，而后却陷入为了挣钱而参与职业化的怪圈，“赚钱”由开始的“工具”转变为后来的“目的”。当然，也有一些牧民是“被动地”卷入数字游牧的职业化。这些人面临经济困难的窘境，甚至在变卖所有财产后仍没有足够经济实力支持理想中的游牧之旅^{[31][2]}，才“被动地”开始了其牧民之路的职业化进程。因此，数字游牧主义也才会表现出复杂的特质：一方面，其围绕着“发现”与“自我发现”试图展现自由美好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事业心、财富创造也在不断重塑它的轮廓。

此外，游牧社区在塑造数字游牧主义的过程中也同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害怕孤独”使很多数字游牧民热衷于游牧社区的发起与参与，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好游牧生活背后的“阴暗面”^[29]——数字游牧仍然会引发人们因孤独感而产生的焦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游牧主义与其他的临时就业相比并无特殊之处。

“如果给数字游牧民生活的障碍排序，若收入排第一，孤独大概会排第二，甚至并列第一。对孤独的不可承受，让一些数字游牧民选择了退出，也让想成为数字游牧民的人感到疑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泰国，我都遇到过因为太过孤独而重回职场的数字游牧民。这种孤独的体验就像‘你在船上睡觉，没有人看得到你，也不会有任何船经过你。离岸几十公里之后，连手机信号都没有，你和一切失去联系’。”（来源：谷雨实验室公众号）

除了孤独感，大部分数字游牧民承认“自由是相对的”，即便离开了办公室，也需要“不停地努力”“不能躺平”。多数人为了提高收入水平而身兼数职，每天的工作时间也不亚于坐班，用“工作时间的灵活性换取了工作地点的灵活性”。

“我其实现在做的几个事情，第一个职业咨询，是我主要做的事情，第二个是求职顾问，第三个是某实习平台的求职导师。”（被访者编号：20230323DL-1）

“我会根据每天的工作，来安排今天的时间。工作还是首要的。我甚至可以工作一天就哪里都不去。”（被访者编号：20230329DL-1）

“近来各大媒体的宣传中，数字游牧民的生活看起来可谓自由恣意——不用通勤，四处旅居，地理套利……但是，他们也许不知道，这意味着在工作时被要求：钉钉随叫随到，微信即时响应。生活工作混杂不清，完全失去自主时间……”（来源：DNA数字游牧公社公众号）

访谈中，部分数字游牧民认为，工作量虽然不小，但是却有意义、充实、“有缓冲”。然而，这样的“新鲜感”和“意义”一些时候成为他们推动自己“无休止”工作的“麻醉剂”。

“其实有很多时候我是觉得疲惫的，但是这样的工作有缓冲、有意义和新鲜感。比如说这次（带队）去的是第一次去的地方，就会很有新鲜感。白天的时候我是不敢掉链子的，我基本上很少让

自己休息。我休息时间都是在晚上。”(被访者编号: 20230417XS-1)

总之, 数字游牧主义的职业化可理解为: 充分借力于合作共赢与社区帮助的, 以成为“合格”的数字游牧民为目的的, “资格”准备、合作共赢、内容变现等一系列行动和趋势。如果没有充足准备, 没有漫长游牧旅途中的合作对象, 没有思考如何基于其游牧身份的内容变现, 很难达成数字游牧民的顺利转型。转型并不意味着终点和胜利, 焦虑和孤独感随时可能来袭, 此时的游牧社区也就成为牧民们的栖身之所, 人们聚集于此寻求帮助与合作, 缓解负面情绪。因此, “新型”的工作—生活范式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的职业生涯一隅, 是张贴着“罗曼主义”标签的“实用主义”。即便是为了摆脱传统职场中的孤立感而选择游牧, 这个阴暗面也难免会在“自由”与“理想”的追逐中重现。

(三) 制度化——为脱离“依附”而选择“依附”

数字游牧民看似能够以自身无边界的主体性打破“社会契约”的束缚, 但实践中, 他们为了离其渴望的“自由”更进一步, 依旧会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各类国家机制。

早期的相关研究描述数字游牧民的主体性是一种抵制固定地点和固定时间办公, 崇尚个人主义和自力更生的一种无边界且不受束缚的自由形式^[30]。这种主体性往往会给国家政府规制与公民身份认同带来诸多问题。自新冠疫情以来, 远程工作实践和 WFA 等相关术语开始流行^[31], 数字游牧主义渐成为热议之题。虽然 2020 年的全球封控大大削弱了数字游牧民的出行能力, 但各国政府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随后相继出台的远程工作支持法案, 酝酿了大家对数字游牧生活的憧憬。然而, 主体性的追求是否能完全脱离社会契约的束缚, 仍有待探究。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 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基于一种权衡——个人可能放弃部分自由以换取安全和保障^[32]。Locke 和 Laslett 则认为社会契约是可选择的, 个人可以撤回对不喜欢的社会规则的认同, 甚至远离国家制度^[33]。然而, Hume 认为大多数人实际上无法真正脱离制度^[34]。数字游牧民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 也面临着与国家建立新平衡的权衡, 并未完全获得预期的自由。例如, 从事商品代购的数字游牧民会发现, 他们需要遵守亚马逊等平台的法规, 这限制了他们想象中的自由交易和无国界生活。

Mancinelli 指出, 数字游牧主义是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一种机会主义适应, 它倡导自主、自立、自我管理理念, 看似浪漫, 但实际上, 数字游牧民为了体验所谓的无边界自由, 需要重新设计工作空间, 学习劳动法、税务和签证规则, 逐渐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35]。这个过程中, 他们已经悄然融入了国家的制度体系, 而非完全摆脱。

中国情境下的数字游牧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大部分数字游牧民并没有真正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游牧, 即便出国游, 也只停留在“游(牧)”而非“(工)作”。然而, 我们却也依稀能够发现数字游牧的制度化萌芽。区别于国际游牧的签证障碍, 目前国内游牧最大的障碍在于难以保障“工作的连续性”, 也即我国的远程工作市场密度仍显不足, 相应的工作需求还不能完全满足数字游牧民的劳动力供给。

“目前签证不算一个特别大的障碍, 大部分人都还停留在国内游。有没有公司要雇用你, 这才是最大的障碍。你得不断在当地找工作, 来支持生活支出。”(被访者编号: 20230424XS-1)

此外, “政策不稳定”“可选游牧地点局限”“游牧成本太高”“缺乏相关权益保障”也是现阶段国内数字游牧民们提及较多的制度性问题。就此, 数字游牧民们已经与“脱离制度依附”的初衷相去甚远。这些问题与困境的提出, 深层次上反映了他们远离制度化的期许与难逃制度化的实践之间的矛盾与纠结。于是, 我们看到, 数字游牧民虽然寻求“自由”却从不试图“脱离”

体制，反而期待或正在获得来自政府的支持与保障。

“我们在A地这边的项目现在已经在政策规划当中了，它有点类似于修民宿，会有一些政策手续需要办理，这个时候政府能够从政策上支持一下。我们当然也希望获得支持。”（被访者编号：20230503XS-1）

虽然目前处于初级阶段，所呈现的问题与现象不同于国外，但我国的数字游牧民仍然呈现出上述“制度化”萌芽的趋势。“胸怀自由与远方”的数字游牧民将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性”和特定形式的“契约主义思维”融合在一起，幻想着在参与社会契约的同时打破社会契约，却无时无刻不在受到，甚至主动追求其所想远离的国家规制体系的影响。

综上，所谓数字游牧主义的制度化应理解为：旨在实现“自由”“自主”游牧之目的而不断调整外在行为和内在认知，以迎合国家、地区治理体系的动态过程，即为了脱离“依附”而选择“依附”。数字游牧主义实质上阐释了一种形式“自由”却暗含契约主义思维的旅居理念，人们在尝试摆脱“束缚”的过程中重归于“束缚”。于是，数字游牧民们跌进了无法逃离的“期待——妥协——束缚——期待”的循环中，为了“自由”而自我安慰式“暂时性”妥协，却不能如意地换来理想中的“自由”，等待他们的依旧会是妥协后的“束缚”，部分人仍能够重新开始期待。这种主体性需求和具体实践妥协的混杂一定意义上模糊了社会契约原本的概念。

（四）元工作——“看不见”却“不能少”的付出

元工作指的是“使工作能够成功^[36]或顺利进行的工作”。元工作涵盖各类“看不见”的活动，被视为“普通”“枯燥”“乏味”的代名词^[37]。虽然元工作本身并非正式工作过程的组成，涉及的活动本身、所需技能和相关困境也通常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但仍对正式工作的有效落实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源动员工作、衔接工作、过渡工作三类形式的元工作揭示了在被“迪士尼化”的数字游牧主义表面下，人们正在为理想中自由美好的游牧梦买单而承受巨大压力。

普遍意义上，资源动员工作“是以支持用户为实现其主要工作目标而必须执行的二次协调工作”^[38]。对数字游牧民来说，资源动员指的是建立和维护起当游牧民到达新环境时就能马上投入工作的社会、物质基础设施，包括物质资源动员与社会资源动员两类。这是最基础的元工作形态，因为在解决这个维度的问题前，任何其他活动都无法进行。这项元工作的某些部分是可预测且能在到达新地点之前就“提前”完成的。其中，物质资源准备主要是寻找合适的工作地点和旅居生活所需的“大本营”，是基本的资源动员，相较而言，后者会更困难一些，特别是携家属一起游牧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这也是目前国内游牧民基本都是未婚无孩状态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资源动员耗时耗力，数字游牧民不仅得自备工作、生活所需的各类设备，也要学会创造地的整合当地资源。另外，大部分人表示“务必要”累积一笔“赎身钱”，有了这笔钱以后，就可以不必为了生计而继续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他们认为这笔钱是应对游牧中不确定性的必需品，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游牧中“钱”以外的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上。

“对于想成为数字游牧民的人来说，一笔‘赎身钱’是有帮助的。它或许是你的工作积蓄，又或者是投资理财的收入，只要能让你不工作一段时间也能很好地活着，它便是你面对收入不稳定的底气。”（来源：谷雨实验室公众号）

衔接工作代表“结合众多工作任务，结合不同劳动者的多样付出，结合任务与劳动者”的工作^[39]。既有研究强调，衔接工作在建立与维护合作及冲破困境中扮演重要角色。工作的复杂程度取决于

旅居地条件、本身健康状况、家属情况等。此外, 衔接工作还涉及与他人的互动, 包括正式的交流 and 使自己“远程可见”。具体而言, 数字游牧民需要努力让其所从事的活动对合作者和客户可见, 并时刻关注后者动向。数字游牧民们需要尽力明确自己的行为, 以确保有恰好的信息量提供给目标对象(合作对象和客户), 保证自己赖以谋生的业务量。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通过“过度工作”来维持他们的业务, 由此心生压力, 而这无异于传统企业中面对业务压力的雇员。

“所以我后期可能还会优先去做 YouTube, 去输出一些云南那些植物的故事, 得增加曝光率吧, 这样才能有活干啊。”(被访者编号: 20230329DL-1)

“赚钱的这个事情, 如果说要去提炼两个关键词的话, 一个就是能够被看到, 然后第二个是可衡量。就被看到而言, 第一个你人能被客户看到, 然后第二个是你的能力能够被客户看到。”(来源: 小宇宙播客)

传统意义上的过渡性质的工作包括为了解决跨地区、跨时区的工作碎片化问题而付出的各种努力与活动。Duffy 认为, 空间灵活性的提升必然导致时间灵活性的下降, 二者此消彼长^[40]。个体对空间自主性追求的同时, 也需要承担起维护协同工作的责任。数字游牧民需要尽量缩小时空差异问题带来的“不协同”与“不兼容”。例如, 需要调整自己的时间表以适应客户或合作对象。

“有一些工作性质就没有办法, 就得去适应别人。比如客户要朝九晚六, 你就必须朝九晚六。”“火车上面我在工作, 飞机上面我也在工作。只要客户需要, 我就一晚上得花四五个小时都在工作。”(来源: R 社区焦点小组讨论)

客户与合作者通常不会太固定, 数字游牧民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工作生活节奏, 以满足对方需求, 而这无疑成为他们建立起自己系统化工作模式的绊脚石, 导致工作与协同效率的低下。游牧民们需要不断协调本地与外地的事务, 还需要开拓一条看似不可能的促进工作生活“连续性”的路径。

“我们在做自己的官网平台,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拖延。本来计划 3 月底就上线的, 但现在拖了一个月了。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家缺乏联动配合, 由于都是远程, 以前也没有配合的经验, 大家的时间又都不一样, 所以合作效率比较低。可能今天发现一个问题说要改, 但这个问题真正改可能已经是后天了。一个问题就得花两三天的时间。”(被访者编号: 20230503XS-1)

为了本职工作的顺利进行, 数字游牧民不得不投入没有直接回报和经济价值的“元工作”, 以维持其“美好”“自由”的工作—生活范式, 其中包括: 支持用户为实现其主要工作目标而必须执行的资源动员工作; 链接众多工作任务, 链接不同劳动者的多样付出, 链接任务与劳动者的衔接工作; 为了解决跨地区、跨时区的工作碎片化问题而进行的过渡性的工作。上述这些“看不见”却“不能少”的额外时间与精力的付出, 外加时刻感知到的不确定性, 使数字游牧民们承受巨大的压力, 而这一切在与其“追求休闲”的游牧初衷相悖之同时, 与传统的固定办公的特征却“不谋而合”。因此, 即使作为技术革新时代可能“最具吸引力”的工作形式之一, “不稳定”“波动性”“不平等”也深深嵌入进数字游牧主义合作、公平的光鲜外表下。

六、结论

在德勒兹的哲学价值体系中, 游牧主义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涵, 它不仅仅是一种物理上的

移动,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状态。游牧代表着一种摆脱严苛规制和科层化束缚的配置状态,它倡导反思、反理性、反束缚,并强调多元化的价值。在德勒兹的视角下,游牧民族成为了既定秩序的反叛者,他们的存在挑战了传统的权威和规范,体现了一种对自由和创新的追求。与德勒兹的游牧理念异曲同工,我国蒙古民族的游牧文化同样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精神特质。蒙古游牧文化以“开放”“流动”和“进取”为核心特征,这种文化的形成与蒙古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广阔的草原上,蒙古民族通过游牧的方式适应自然环境,形成了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同时,这种游牧生活方式也培养了蒙古民族的开放心态和适应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寻找新的机会和资源。

数字游牧主义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传统企业格局的一种破裂与变革。亦如德勒兹所提和我国蒙古游牧民族倡导的“自由”“解放”“不墨守成规”,数字游牧主义表面上呈现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反对,一度被视为颠覆性的变革。然而,通过对国内数字游牧民的访谈、参与式观察和线上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即便处于发展初级阶段,我国数字游牧主义发展过程中自身的商品化、职业化、制度化和背后的元工作却在不断模仿和呼应传统商业活动和制度体系中的权力动态。某种意义上,数字游牧主义应称为对市场需求的回应和资本主义的延伸。数字游牧主义所展示的“标签”实际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内涵遥相呼应,“协同合作”“去中心化”“罗曼主义”“独立自主”被“利益驱动”“实用主义”“制度依附”和不能间断的“元工作”所取代。

一直以来,各界之所以对数字游牧主义的轮廓认识不清,是受到数字游牧民的表现形态多样化(从自由职业者到远程工作者,再到独立企业家)和人们内心所勾绘的乌托邦的影响。“倘若一个人不能持续无边界的游牧生活,那只能责怪他自己”,“任何人,只要想,就可以做”的言论被数字游牧民们深深内化,他们认为“流动性”和“地点依赖”的有无只取决于个体意愿与努力程度。然而,加入并维持数字游牧生活却需要跨越较高的门槛:深谙商业规则、善长自我营销、精通技能经验、付出额外努力,而这些仅是成为数字游牧民的基础,人们还需忍受无穷尽的不确定性、难以消解的工作压力与不能诉说的孤立无援。

综上,研究认为这个“全新的”工作的世界(数字游牧主义)也许只是传统结构性不平等的复刻和极端形式的资本主义深化。“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究其本质,数字游牧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就业并没有区别,它虽然援引了一种自由、解放的游牧民族形象,却正在变得越来越商品化、职业化和制度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过剩人口的产生机制,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一个必然结果。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减少。这样,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即使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可能在增长,也总会有一部分劳动力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成为过剩人口。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和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和过剩人口的产生。数字游牧民看似出于自愿放弃了大城市中的传统就业,选择成为数字游牧民,但这种选择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市场逻辑——他们实际上是被市场机制淘汰的流动的过剩人口。这些个体虽然以数字游牧民的身份自居,但实质上仍然是灵活就业。数字游牧民这一群体在表面上享受着自由职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但这种自由并非没有代价。他们的工作常常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不仅对他们的经济状况构成了挑战,也给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了影响。收入的不稳定性使他们难以进行长期规划,而社会保障的缺失则意味着他们在面临健康危机或其他不可预见的事件时缺乏必要的保障。此外,数字游牧民的工作性质往往要求他们具备高度的自我管理能力和适应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工作环境。这种灵活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职业发展的可能性,但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增加了职业不安全感。

而在后疫情时代各国人才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下,远程工作风靡,如何以留住人才为目的,为

人们“游牧”之路扫除障碍、给予支持,也许是今后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着力考虑的一大关切。社会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对包括数字游牧民在内的灵活就业群体的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深入的审视和改革。这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和教育机会,增强他们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建立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他们在面临风险时能够得到必要的支持,推动劳动法的改革,保障灵活就业者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 [1]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workforce [EB/OL]. [2020-02-15]. <https://www.mbopartners.com/state-of-independence/>.
- [2] MÜLLER A. The digital nomad: Buzzword or research category? [J]. *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 2016, 6(3): 344-348.
- [3] AROLES J, GRANTER E, DE VAUJANY F X. 'Becoming mainstream':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and corporatisation of digital nomadism [J].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2020, 35(1): 114-129.
- [4] CHEVTAeva E, DENIZCI-GUILLET B. Digital nomads' lifestyles and coworkation [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21, 21(3): 1-7.
- [5] DELEUZE G, GUATTARI F.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 [6] ENGBRIGTSEN A I. Key figure of mobility: The nomad [J]. *Social Anthropology*, 2017, 25(1): 42-54.
- [7] CURRAN H. Introducing fiverr' s chief digital nomad [EB/OL]. (2018-02-05)[2024-08-01]. <https://blog.fiverr.com/post/introducing-fiverr-s-chief-digital-nomad>.
- [8] HARRIS J. In a world of digital nomads, we will all be made homeless [J/OL]. *The Guardian*, 2018[2024-08-01].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jun/18/digital-nomad-homeless-techwork>.
- [9] FRANKEL B. *The post-industrial utopians* [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 [10] CARRINGTON T. French biggie scans geopolitical future [J].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991: 5.
- [11] ATTALI J. *A brief history of the future: A brave and controversial look at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09.
- [12] MAKIMOTO T, MANNERS D. *Digital nomad* [M]. Chichester: Wiley, 1997: 15-36.
- [13] SUTHERLAND W, JARRAHI M H. The gig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J]. *Proceedings of the ACM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017, 1(1): 1-24.
- [14] SOBEL M, ROSSI P H. *Lifestyle and social structure: Concepts*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15] WANG B, SCHLAGWEIN D, CECEZ-KECMANOVIC D, et al. Digital work and high-tech wanderers: Three theoretical framings and a research agenda for digital nomadism [EB/OL]. [2024-08-01]. <https://aisel.aisnet.org/acis2018/55>.
- [16] KUZHELEVA-SAGAN I, NOSOVA S. Culture of digital nomads: Ontological, anthropological, and semiotic aspects [M/OL]. *IASS publications*, 2014[2024-08-01]. https://iass-ais.org/proceedings2014/view_lesson.php?id=64.
- [17] HEMSLEY J, ERICKSON I, JARRAHI M H, et al. Digital nomads, coworking, and other expressions of mobile work on Twitter [J]. *First Monday*, 2020, 25(3): 1-7.
- [18] HANNONEN O. In search of a digital nomad: Defining the phenomenon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020, 22(3): 335-353.
- [19] 德勒兹, 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千高原* [M]. 姜宇辉,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3.
- [20] NOYES J. Nomadism, nomadology, postcolonialism: By way of introduction [J]. *Interventions*, 2004, 6(2): 159-168.
- [21] AROLES J, MCLEAN C. Smoothing, striating and territorializing: The assembling of 'science in the making' [J]. *Ethnography*, 2021, 22(1): 111-130.
- [22] BRAIDOTTI R.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3] 陈永国. *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M]. 2版.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
- [24] 黎霞, 苏婷婷, LI G, 等. 新型旅行群体——数字游牧民: 概念、演化与研究进展 [J]. *旅游学刊*, 2023(1): 122-133.
- [25]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 [26] 陈巴特儿. 试论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变迁及其特点 [J]. *内蒙古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3): 66-69.
- [27] NORUM R E. The unbearable likeness of being a tourist: Expats, travel and imaginaries in the neo-colonial orient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Research*, 2013, 3(1): 27-47.
- [28] COOK D. Breaking the contract: Digital nomads and the state [J].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022, 42(3): 304-323.
- [29] THOMAS M. Ditching the office to work in paradise as a "digital nomad" has a hidden dark side [J/OL]. *Quartz*, 2016(1)[2024-08-01]. <https://qz.com/77575>.

- [30] REICHENBERGER I. Digital nomads—A quest for holistic freedom in work and leisure [J]. *Annals of Leisure Research*, 2018, 21(3): 364-380.
- [31] NEWBOLD J W, RUDNICKA A, COOK D, et al. The new normals of work: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responses to disruptions created by new futures of work [J].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022, 37(6): 508-531.
- [32] HOBBS T, TUCK R, SILVERTHORNE M. *On the citize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3] LOCKE J, LASLETT P.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34] HUME D.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M].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7.
- [35] MANCINELLI F. Digital nomads: Freedom, responsibility and the neoliberal order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020, 22(3): 417-437.
- [36] SALZMAN M, PALEN L. The tools we live by: A description of personal support media in work life [J]. *Computer Science Technical Reports*, 2004: 1-11.
- [37] SCHMIDT K. Reflections on the visibility and invisibility of work [M]// BOWKER G C, TIMMERMANS S, CLARKE A E, et al. *Boundary objects and beyond: Working with leigh star*. Mass: MIT Press, 2016: 345-350.
- [38] PERRY M, BRODIE J. Virtually connected, practically mobile [M]// ANDRIESEN J H E, VARTIAINEN M. *Mobile virtual work: A new paradigm?*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05: 95-127.
- [39] STRAUSS A. Work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85, 26(1): 1-19.
- [40] DUFFY B E. (Not) Getting paid to do what you love: Gender, social media, and aspirational work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The Essence of Digital Nomadism: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Digital Nomads

ZHENG Qi, XU Xinying

(1.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2. School of Insur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105)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nomadism has gradually formed a new trend of professionalization worldwide. This study, based on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digital nomadism, referencing Deleuze and the image of Mongolian nomads in China, employ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observations, and online content analysis to explore Chinese digital nomads. It finds that while digital nomadism advocates "liberation" "freedom" and "autonomy", ostensibly critiquing and opposing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including its commodific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underlying meta-work, continues to mimic and resonate with the power dynamics present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s. In a sense, digital nomadism can be viewed as a response to market demands and an extension of capitalism, presenting itself as promoting "collaboration" "decentralization" "romanticism" and "self-reliance", yet fundamentally it is "driven by profit".

Key words: digital nomadism; commodific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meta-work

[责任编辑: 吕明涛]